

革命先烈黄学增

詹延钦

黄学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广东领导人之一，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敦文村。他在广东轰轰烈烈开展工农运动，也把革命火种带回了广东南路，出色地领导了南路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，被誉为“广东四大农民领袖”之一。

广东不但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，而且是现代中国革命的“发动机”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，大革命风暴如工农运动、省港大罢工和东征、北伐战争都是从这里出发，然后迅速席卷全国。

广州是影响黄学增走上革命道路、开展革命活动最重要的地方。他在这里寻求革命真理，实现人生重大转折。1920年，他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，开始投身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。

黄学增积极推动和维护国共合作，中国共产党的“三大”以后，黄学增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。

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，黄学增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。在省农民协会的统一指挥下，广东农民开始系统地开展行动，形成声势浩大的“广东农潮”。

1925年10月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，选出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。黄学增与彭湃、杨匏安等共产党员，在省党部担负工运、农运党务工作。

1926年1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会上，黄学增斥责了湖南军阀赵恒锡的罪行，提议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。会议通过了黄学增的提议，通电全国，要求赵恒锡立即释放刘少奇。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下，刘少奇终于在1月16日获释。

黄学增积极投身广州近郊花县农民运动。1923年秋，黄学增同阮啸仙、周其鉴等人筹备成立农会，进行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，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黄学增还积极参加领导工人运动。1925年7月3日，黄学增与廖仲恺、邓中夏等人，受聘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，指导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。8月1日，黄学增出席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发表演说，阐明了广东农民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的立场。1926年5月1日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

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黄学增任秘书长并主持大会，会上再次号召全省农民支援省港大罢工。

1924年11月初，广宁县农民自卫军与地主阶级武装在潭布区发生激烈战斗。黄学增与赵自选、阮啸仙等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，迅速入广宁协助彭湃、韦启瑞，加强对广宁农运的领导。

黄学增是深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。1924年下半年，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学增等人，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来到宝安县，黄学增驻第五区，他们首先在沙井、松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，并积极从事建党工作。1925年7月，成立了深圳地区最早的党支部——中共宝安县支部，黄学增任书记，积极培养农民运动骨干。年底，在5个区建立起11个党小组。

党组织的建立，迅速推动了省港大罢工运动在宝安县的深入开展。11月14日，黄学增以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和农运特派员身份来到沙井，协助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查办土豪劣绅的恶劣事件，遭到土豪民团袭击。最后，交由省港罢工委员会上诉，要求国民政府对土豪进行严肃处理。

1927年4月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西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4月中旬，广东区委派出农运领导干部黄学增到西江主持武装暴动。4月下旬至8月底，黄学增组织和发动肇庆反蒋起义、郁南都城暴动、四会人民的反抗斗争，罗定、横岗再次暴动等系列暴动。黄洲会议后，黄学增领导的西江特委根据形势，在8月至11月相继发动广宁江美坪、高要乐城、广利等地武装暴动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。1928年1月，广宁暴动（螺岗暴动）爆发。农民赤卫队300余人进驻螺岗，召开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，宣布成立广宁县苏维埃，影响很大。

1928年5月至6月初，琼崖暴动遇到严重挫折。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，到琼崖主持恢复工作。经过努力，琼崖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，11月16日至24日，黄学增出席在香港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，当选广东省委候补常委。会议决定将南路、琼崖两个特委合并为南区特委。

1929年1月18日，黄学增由省委候补常委递补为常委。5月26日，省委决定立即重建中共琼崖特

委，要求黄学增以省委巡视员身份重返琼崖指导工作。6月初，黄学增返琼崖后，隐蔽在海口市福音医院，开展秘密工作。但是，1929年7月，因叛徒出卖，黄学增在海口市被国民党逮捕，同月，英勇就义于海口市红坎坡。

黄学增在当地的大革命洪流之中迅速成长，助力这里革命运动的发展。同时，他把革命火种带到了南路和琼崖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这片土地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第一，推动了南路革命运动的兴起。1922年7月至8月，黄学增返乡成立“青年同志社”。1925年9月，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，返乡成立了雷州半岛第一个党组织——雷州特别支部。1927年4月，中共南路特委书记黄学增策划发动南路农民武装暴动。5月19日遂溪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暴动。6月25日，农军举行震撼南路的乐民武装起义。

第二，扭转了琼崖暴动遭受严重挫折的革命局面，为琼崖恢复革命力量铺垫了道路。1929年，黄学增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，黄学增任师政委。经过艰苦努力，琼崖党的力量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

第三，黄学增不时撰写文章提出革命主张，对全省乃至全国开展工农运动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。1926年4月1日，他撰写的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》发表在《中国农民》杂志上。1926年8月，黄学增为纪念廖仲恺先生遇害一周年，写了《仲恺先生死了吗吗？》一文。1929年6月，黄学增写的《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》，在《红旗》周刊第16期刊载。

黄学增的生命是短暂而光辉的，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红色旗手。1960年2月10日，周恩来总理到湛江视察工作时，特别向湛江地委领导介绍了黄学增的革命事迹。为落实周总理指示，中共湛江地委迅速拨专款修建黄学增故居和纪念亭，陈列和宣传黄学增的革命事迹，供后人参观学习，弘扬黄学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、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，让黄学增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，永远传承下去。

（作者系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，“时代湾区”专栏特邀作者）

粤赣湘边人民的子弟兵

李建国

身为曾经的中国军人，虽没有亲历过战争，但对参加过战争的父亲、母亲和他们的战友、前辈非常崇敬。

父亲经历过剿匪、辽沈、平津和解放华中、华南的大战，他所在的部队，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。母亲所在部队的前身，则是“华南抗战的一面旗帜”—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了国内和平，东江纵队骨干北撤山东。因特殊原因，大多数留下来的同志，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武装，最终经中共中央军委编制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。

命名为粤赣湘边纵队，是因为部队活动在整个粤赣湘边区。这里幅员广大、纵横千里，西起粤汉铁路，东至潮汕兴梅，北依巍峨五岭，南临浩瀚大海，包括广东的始兴、南雄、曲江、连平、五华、兴宁、紫金、增城、惠阳（含惠东）、宝安、东莞、中山、顺德；江西的南康、信丰、崇义、万安、泰和；湖南的桂东、汝城、耒阳、郴县、桂阳等50余县的广大区域。

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，曾解放了今天的深圳。粤赣湘边纵队的指战员，是坚定的共产党人，是听党指挥的骁勇军人，是为了人民、为了战友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革命志士。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，涌现出为了保护指挥部首长和同志们，用身体压住敌人投来手榴弹的排长；有肠子被打出来，仍然奋勇杀敌，最后献出生命的小战士；有被敌人逮捕，英勇不屈惨遭杀害的女民运干部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粤赣湘边纵队指战员按组织安

我之所以从小对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感受至深，是因为不止一次听妈妈说起她英勇牺牲的二哥曾振辉，他是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二团盐田税站的站长。1949年春节后的一天清晨，国民党军趁雾色突然包围了盐田税站。他在浓雾中向敌人开火，边打边退向海边的避风塘，吸引敌人，为掩护其他同志向山上撤退赢得了时间和机会。而他却因腿部负伤，行动不便，暴露在避风塘空旷的海滩上，被敌人乱枪扫射，英勇牺牲，年仅21岁。

这支部队是粤赣湘边人民的子弟兵，数不清多少男女老少加入这支部队，也数不清多少父老乡亲曾经不顾危险，支援过这支部队。他的舅舅牺牲后，敌人将他曝尸海滩，任由涨潮的海水把他冲走，是盐田的人民群众悄悄把他收殮，埋葬在面向大海的小山上……

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作战部队由1946年冬的470人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3.8万多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47年1月至1949年9月，共进行较大战斗848次，毙伤敌7400余人，俘敌1.1万余人，合计歼敌2.52万人；缴获各种火炮78门，轻重机枪934挺，长短枪、卡宾枪、手提机枪2.38万支，军用物资不计其数。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，这支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粤赣湘边纵队指战员按组织安

排，奔赴粤赣湘桂乃至全国各地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，我母亲就曾调往中央国家机关工作，他们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。改革开放后，他们大多已成为领导干部，依然不忘初心，艰苦奋斗。从建立特区，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深圳的中层和基层领导干部很多还是他们。可以说，深圳今天的基础是他们亲力亲为奠定的。

2019年7月10日，深圳市原粤赣湘边纵队战友联谊会、深圳市东纵边纵研究会会员，龙华办事处、龙华弓村、福田水围、平湖山厦、罗湖蔡屋围等当年革命老区的领导干部、群众代表及社会各界嘉宾600余人，在深圳市龙华区弓村召开了纪念边纵成立70周年暨《大转折——深圳1949》新书发布会。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到会祝贺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

此次纪念大会隆重举行，充分体现了老同志们在新时代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的精神，他们不顾双目失明、不顾年老体弱、不顾风雨袭来，执意出席，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峥嵘岁月的缅怀和对党的事业寄予的期望，体现了东纵边纵老同志的后人继续传承红色革命传统，将前辈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。

粤赣湘边纵队的英雄事迹以及革命精神，如今，仍在传承发扬，成为我们伟大人民军队优良革命传统的组成部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会长，“时代湾区”专栏特邀作者）

曾有细心的人绘出广州老城区越秀区的“红色文化地图”，数十个近代革命历史遗迹，大多保存完好，一一掩映于闹市的绿树丛中。沿着这地图行走，在感知广州千年商都风貌和繁华市民生活的同时，也得以重温这里的红色记忆。

如何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，更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了解和铭记一段段血与火的历史，广州的做法值得借鉴。不是将历史遗迹隔绝于市民生活，而是将它们融于市民生活中，使之与热闹生动的都市生活交织相容。

不久前，广州越秀区以红色历史遗迹为“圆心”，动员附近中小学的少先队员，以自发报名的形式，组成红色宣讲队，通过“小手牵大手”的方式，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，感受红色文化。迄今已有800多名小讲解员参与。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小小讲解员而言，这样的活动意义非凡。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，向人们讲述广州英雄城的光荣历史，是对红色文化最好的传承。

曾有人问我为何选择住在陵园西路，我说，是为整条道路两侧高耸入云的木棉树所吸引，花城有好运，一树红鸾啼，木棉花正是广州这座英雄城的市花，我们又称它为英雄花。每到初春二三月，这里到处红彤彤一片，花团锦簇，奔放热烈。英雄的木棉花点缀着广州的红色史迹，也映衬着这座英雄之城传承革命文化的初心底色。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，“时代湾区”专栏特邀作者）

40年前的1979年，宝安县升格为市，改名为深圳，一座年轻的城市诞生于古老的土地上。深圳原来是个墟镇的地名，意思是“深的河沟”，而宝安这片土地，历史要悠久得多，在历史上曾经叫宝安、新安。

深圳市成立后不久，为了特区建设需要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一支队组织一个团的兵力，从冰天雪地的东北，南下到郁郁葱葱的南海之滨，参加共和国最年轻的一座新城的建设。从此，一支部队与一座城市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成立于1966年，诞生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秉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肩负起共和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重任，承担着国家大型基本建设和国防工程建设任务。最鼎盛时，基建工程兵兵力达到近50万人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党中央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，基建工程兵部队兵种撤销，实行向地方建设大军的战略转型。基建工程兵的2个师2万人奉命调入深圳集体转业，成为深圳特区建设施工的生力军。

在大家的想象中，毗邻香港的深圳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城市，但刚一下火车，眼前荒凉、落后的景象，让人大吃一惊：市区街道狭窄，房屋建筑破旧，连内地的许多县城都不如。罗湖老东门一带是市区中心，街道很短，点上一支烟还没抽完，就从这头走到了那头。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面5层高的深圳旅店，街道很多地方都是土路。

使命就是冲锋，没有时间停下来叹息，广大干部职工立即投入了安家、拓荒的战斗中。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居民有2万人，而调入的两个师加上家属、子女多达4万人，两倍于当地居民，吃饭、喝水、住宿都是大问题。进入深圳第一天，很多干部职工就开始挖地为灶，支锅煮饭。没有水喝，就就地掘井，或者将工程车改成运水车，从市里拉水喝。他们学习当地民工队的办法，为解决住的问题，用毛竹搭架、编竹叶为竹排做墙、牛毛毡盖顶防雨。一夜之间，深圳荒草地上冒出了几百栋竹棚，这就是南下拓荒、深圳建设者们最初的家。就这样，他们在祖国的南疆扎下根来，竹棚冬天不遮风，夏天不遮雨，一个火星就会燃起大火，若一个不小心，干竹棚燃起烈火，干部职工的家园就会化为灰烬。

刚落户深圳的前几年，由于全国压缩基本建设战线、艰难摸索市场经济的路子、遭遇强台风袭击等多种原因，遇到了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困难，吃了很多苦头，也走了一些弯路，一些干部职工甚至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。1986年《特区文学》第5期，发表了我与吴启泰同志撰写の中篇报告文学《深圳·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》，反映了当时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然而，苦痛是意志的磨刀石，挫折是成功的考验关。面对挫折和困难，深圳建设者们不怕失败，从不后退；敢打硬拼，迎接挑战；不怕困难，日夜奋战。他们先后建起了一批深圳最早的标志性建筑：高档的友谊商场和洋溪酒家，庄重的市委办公大楼，特区第一栋楼、高20层的深圳电子大厦；参与了当时中国第一楼、53层国贸大厦的建设，为创造闻名全国的“三天一层楼”的深圳速度出大力、流大汗。

在集体转业10年后，深圳的建设者们迎来了辉煌时期。1991年，由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组建的深圳市建设集团，被评为年度深圳市最大国营盈利企业第三名、最大房地产企业第一名。1995年建设集团被国家建设部评为全国先进施工企业。1993年、1994年，国家有关部门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两次召开关于深圳市建设集团改革经营制度研讨会。《人民日报》大篇幅报道了深圳市建设集团的经验。彩虹总在风雨后，广大干部职工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程中，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这支队伍在深圳建成了高层、超高层建筑上千栋；参加了福田中心区、车公庙、深圳湾

神奇土地上两万人拓荒

段亚兵

等片区以及深圳机场、皇岗口岸保税区等移山填海约40平方公里项目的施工；参与了深南大道、北环大道等市政道路和桥梁（立交桥），深圳体育场馆等大运会项目，报业大厦、中心书城等文化产业项目，师范学院、深圳大学医学院等高等院校，人民医院、红会医院等三甲医院，及许多居民住宅小区和商业办公楼等公共设施的建设。可以说在深圳这片热土上，每一处土地上都洒下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汗水。

2018年全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《深圳拓荒纪实》一书。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：一座城，两万人，四十年。在过去40年的时光里，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中，2万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与一座城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，同命运，共发展，把南方边陲小镇建成了现代化大都市。

在深圳市委大门口，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了一座铜牛雕像：老牛勾头蹬腿，鼻喘粗气，筋肉凸暴，用尽浑身力气，正在将一个深埋在土地里的千年老树连根拔起。铜牛雕像是那样形象传神，深得市民喜爱，人们为铜牛起名为“拓荒牛”，一致公认拓荒牛就是深圳创业初期建设者们的形象。我在《深圳拓荒纪实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也许可以这样评价这支队伍：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，这支队伍是变革者、弄潮儿；深圳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地，这支队伍是实践者、成功者；深圳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哨阵地，这支队伍是马前卒、排头兵。”

广大干部职工在深圳拓荒创业过程中创出的拓荒牛精神，是深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。深圳在改革开放40年里，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，创造出经济腾飞的奇迹，拓荒牛精神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。深圳的拓荒牛精神，与红船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延安精神等一脉相承，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。

（作者系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，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，“时代湾区”专栏特邀作者）

英雄城的初心底色

郑上保

我曾有一段时间居住在陵园西路上，不远处，就是著名的广州烈士陵园。每有朋友来访，总习惯带他们到里面的陵园转转。作为1927年广州起义烈士的安葬地和纪念地，烈士陵园多年前就已成为广州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，园内佳景“红领巾日”更是“羊城新八景”之一。

时常看到有人在纪念碑前肃穆地站立，或是一圈圈绕着墓地走，像是在沉思和缅怀。也常有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，导游讲解着陵园的历史。更多时候，是老人在这里晨练，傍晚，居民沿着陵园大道散步，闲聊之间是日日如常的平淡闲适。

广州人生活在这座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旁边，无论老翁还是孩童，都对广州起义耳熟能详。恢宏庄严的陵园、雄壮沉重的历史，与悠闲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了统一。

作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，广州是一座爱仁不让的英雄城，这片老城区中遍布像烈士陵园这

